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九一八事变

王文治 编写

新华出版社

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九一八事变

王文治 编写

目 录

一、蓄谋已久的方针.....	(1)
二、转嫁危机的出路.....	(8)
三、箭在弦上.....	(12)
四、柳条沟事件.....	(21)
五、“不抵抗主义”	(28)
六、抗日义旗不倒.....	(35)
七、锦州和辽西的陷落.....	(41)
八、激战哈尔滨.....	(46)

发生在1931年的“九一八事变”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占领中国东北，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而策划的一次军事阴谋。它不仅使大批中国居民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。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曾有过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。到了近代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，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，中日两国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。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发生，更激化了这种紧张关系，从而导致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。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，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独立。

一、蓄谋已久的方针

侵占中国东北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。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为贯彻这一既定方针所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。它不是偶发事件，是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。

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，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飞速

发展，但是土地制度却仍然是半封建的，工业和农业之间，工业各部门之间，工农业和商业、金融业、运输业之间，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。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和狭小的国内市场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，日本统治者开始策划向外扩张势力，地大物博，同时又是古老落后的中国，就成了它掠夺和侵略的理想对象。在第一届日本国会上，当时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公然宣称：“国家独立自卫之道，一是捍卫主权线，二是防护利益线。”并解释说：“何谓‘主权线’？国家之疆域是也。何谓‘利益线’？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。”他的目的，是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等地规划为日本的“利益线”，成为日本“防护”的范围。

中国的东北为什么被日本侵略者看得如此重要？“九一八事变”的策划者，后任关东军参谋长，日本陆军大臣，兼对满事务局总裁的板垣征四郎曾作过交代。他在所著《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》一文中说：“从战略上来观察，满蒙（大体指东四省的范围）北以黑龙江，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，西南以松岭、七老头、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，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，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。”他还提出，谁据有“易守难攻”的东北地区，谁就可以“利用天险，退而培养国力，整顿兵马”，一旦“时机成熟”就可以“猛然奋起，越过天险，侵入中原，以统治汉民族”的主张。日本重视中国东北，并企图攫为己有，除战略上的考虑外，还有经济上的原因。众所周知，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，它的煤矿总蕴

藏量只有65亿吨，占世界煤蕴藏量的0.2%。其他如铁、石油、铅、锡等矿产原料，以及木材都要依赖进口。日本国内可耕地面积严重不足，粮食和棉花也需依赖国外市场。东北地大物博，自然资源丰富，铁、煤、铜、铅、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、集中。东北森林面积达1800余万公顷，占全国1/3。东北土地肥沃，农产品丰富，且有大批荒地可供开垦，因此，对于资源贫乏，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来说，地理条件方便，物产丰富的东北，自然就变成他们理想的原料供应地了。

为了实现上述目的，称霸亚洲，1894年（甲午年）7月25日，日本不宣而战，在朝鲜的牙山附近海面上，击沉一艘中国运兵船，从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。并于1895年4月17日，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除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之外，还要求中国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，以便将来进一步侵略东北时，有一个前进的据点。

在当时，觊觎中国东北领土的还有沙皇俄国。它不但通过《璦琿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，前后夺去中国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还想进一步侵吞整个东北，因此一直把渤海湾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。《马关条约》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，使沙皇认为损害了它的利益，于是就联合法、德两国，于4月23日分别照会日本，要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。日本因为在战争中耗尽了财政和军用品的储备，自觉实力有限，同时也担心“中国也许乘机不批准媾和条约，而使《马关条约》成为一纸空文”，不得已于5月接受了退还辽东半岛的要求。

同年11月，日本和中国签订了《中日辽南条约》，同意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。

俄国向中国东北三省的扩张，不仅“损害”了日本的利益，也“损害”了英、美等国的在华利益。为了与沙俄争夺中国的东北，日本在英、美等国的支持下，于1904年和沙俄之间爆发了日俄战争。沙俄战败后，双方于1905年8月签订了《朴茨茅斯条约》，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划分成为“南满”和“北满”两个部份。沙俄把旅大“租借地”，以及从宽城子（现属长春）至旅顺口之铁路，和与此有关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。在“南满是日本人的”这一口号下，大批日本军队、侨民、投机者涌进中国东北，甚至连艺妓和理发师也成批地迁居至中国的东北。日本不仅获得安东——奉天军用铁路十五年的使用权，获得了长春——吉林铁路的修筑权，还取得了中国“不在南满铁路修筑可能损害日方利益的干线和支线”的保证。

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，日本把从沙俄手中夺取到的辽东半岛改为关东州，并于1906年设置了关东都督府、奉天总领事馆、和南满铁路股份公司（简称满铁）等侵略机构，作为它进一步独占东北和侵略全中国的据点。关东都督府，是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机构。奉天总领事馆，是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的总办事处，负责日本对东北的外交事务。南满铁路股份公司，则是日本实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机构。后来，日本政府又把关东都督府分成关东厅和关东军两个机构。关东厅管辖关东州（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皮口一线以南

地区），还掌管南满铁路线的警察事务，并监督满铁业务。关东军原是关东都督府的陆军部，为了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，防范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，1919年4月11日，日本政府把关东州的陆军部改名为关东军，并颁布了《关东军司令部条例》，正式成立关东军司令部。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大将或中将充任，直属日本天皇，统帅驻南满及关东州的陆军，“防卫”关东州和“保护”南满铁路沿线。“满铁”表面上是经济组织，实际上是日本侵华的特务机构，它所属的“满铁调查部”，就是专门为日本有关方面提供情报的。此外，“满铁”还利用开办学校、发行报刊等活动，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为日本制造侵略有理的社会舆论。至于以金钱为诱饵，通过“入股”、“合资”等手段，拉拢和收买军阀，以及各种头面人物，更是“满铁”的惯用伎俩。因此，“满铁”成了日本掠夺中国物资财富、侵略东北的重要耳目和得力工具。

在东北收买汉奸，扶植侵华代理人，是日本扩张侵略势力的另一个重要手段。土匪出身的张作霖，于1902年受清政府收编后，曾任管带、统领等中下级官职。辛亥革命时，张作霖因表明效忠朝廷，积极迫害革命党人，而被升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。1912年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，他又投靠袁世凯，当上了27师师长。看到张作霖有可能执掌东北大权，日本政府就积极扶植和收买张作霖。日本参谋部为他派了军事顾问，并向他提供武器和各种军需品。日本军事顾问在“确保或扩大日本在东北权益的时候”，经常秘密征得

张作霖的同意，然后才交给外交官通知中国政府，以示日本政府对张作霖的信任。作为回报，张作霖要经常向日本提供国内的各种情报，在作出政治和军事决定时，一定事先征求日本军事顾问的意见。在日本的扶植下，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。十月革命胜利后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宣布：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，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，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，一律放弃。张作霖乘机“驱逐”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督军，并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宣布东北独立。这样，在张作霖逐渐控制整个东三省的同时，日本侵略者的势力也随之扩大到了北满。

辛亥革命后，日本为了扩大在华的“权益”，曾先后扶植过袁世凯、段祺瑞等反动军阀。并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，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要求，其中特别强调扩大日本在东北的“权益”。如要求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、居住权、工商经营权、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等，就是“二十一条”要求的主要内容。此外，在“二十一条”中，日本还要求，如果中国打算给外国人租借地以建铁路，或以地方税为担保条件，向外国借款建筑铁路，必须取得日本人的同意等等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，日本的上述阴谋才没有得逞。

在袁世凯和段祺瑞因为遭到人民的唾弃而先后下台之后，日本政府并不死心，而是继续扶植张作霖，使他两次带兵入关，并于1927年7月掌握了北京政权。“东方会议”之后，日本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修建吉（林）会（朝鲜会宁）等

七条铁路，在东北自由租借土地和经营工商业的商租权、营业权，在临江等地设立领事馆，让日本警察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要求。由于类似的要求曾在“二十一条”中提过，是导致袁世凯、段祺瑞下台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张作霖虽然不敢公开反抗，但也不愿完全俯首听命，而是采取拖而不办的办法。这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不满。

在此期间，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取得了中央政权。1928年春，他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等举行“北伐”，向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发起进攻，并先后在徐州和济南击溃张作霖。日本看到蒋介石的兵力明显优于张作霖，担心蒋军胜利会影响自己的权益，就阴谋策划东北脱离中国，所以劝说张作霖撤兵到关内，并威胁说，如果因失败而退回东北，日军将在山海关拦截。一心想在关内扩大势力的张作霖只得于6月3日很不情愿地乘专车由北京出发返回沈阳。6月4日晨5时30分，张作霖的专车通过南满铁路皇姑屯车站附近的桥洞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预埋的炸药爆炸，张作霖身亡。张作霖这个“特别亲日”的汉奸，只由于后来稍微表现出一点点“不合作”的倾向，就被日本人无情地杀害了。

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，继续策划东北脱离中国的阴谋。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父职出任东三省行政长官，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首相的密令，曾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准与南京政府妥协。8月8日，日本政府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机，派出林权助为特使，再次警告张学良，并威胁说，

如果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妥协，蔑视日本的警告，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决意。关东军杀害张作霖的原因，是嫌他“亲日”不够彻底；日本政府威胁张学良的目的，是想让他更加俯首贴耳。不料适得其反，这些做法加深了奉系军阀对日本的敌意。1928年12月29日，张学良在经过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讨价还价后，通电全国，宣称“遵守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”，并在东北挂起了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旗。张学良的“易帜”，以及对日采取比张作霖更加“不合作”的态度，除考虑政治、经济等因素之外，想报“杀父之仇”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为了改变这种“不利”的状态，关东军也策划出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阴谋。

二、转嫁危机的出路

1927年3月，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，银行纷纷倒闭，工厂停产，使日本进入经济动乱的时代。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痊愈，1929年秋，又爆发了世界范围的规模空前的严重经济危机。危机从美国开始，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。在经济危机风暴的袭击下，工厂倒闭，金融混乱，田地荒芜，工人失业，农民破产，工业生产下降了44%，国际贸易额减少了66%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。到1932年底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下降到最低点：美国下降到1929年的53.8%，英国下降到83.8%，德国59.8%，法国下降到69.1%。

这场危机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，打击尤为严重，在出口下降76.5%，进口下降71.7%的情况下，日本的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。1929年到1931年，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.9%，煤下降44%，棉纱下降17%。生丝下降31%，钢铁生产从1929年到1932年下降了18%，采矿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达到其生产能力的50%。

在危机中，日本政府迅速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转化，对内采取高压政策，以平息国内人民的反抗。1928年，发生了逮捕千余名共产党人的“三一五”事件，4月10日，日本政府又宣布新劳动农民党、日本工会评议会和日本无产阶级同盟为非法组织，勒令解散。4月16日，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，被捕者达3000余人，日本共产党总书记渡边政之辅也于10月6日遭到枪杀。随后，日本政府又制造了1929年的“四一六大检举”，1930年3月的“全国检查”事件，致使数万名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，以及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。

随着日本政府的逐步法西斯化，其对外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也愈来愈强烈。武力占领中国东北，不仅可以实现其“东洋霸主”的美梦，也是解决危机，缓解国内人民斗争的有效办法，因而加快了侵吞东北的步伐。

1927年4月20日，以标榜实行强硬政策的田中义一受命组阁，田中历任军部要职，是政友会总裁，对内主张镇压共产党，对外主张实行“强硬外交”，积极侵略。在组阁前的4月16日，田中曾发表外交演说，鼓吹“因为中国的政局正

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”，所以日本有必要从“自卫的立场”出发，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应措施。组阁后，田中在4月22日表明关于施政方针的声明中，又叫嚣：“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活动，（日本）不能漠不关心。”5月28日，田中以“保护日本侨民”为借口，发表出兵山东宣言，同时由旅顺派兵在青岛登陆，阻止北伐军北上，以防中国革命的火种烧到东北，影响日本在东北的“权益”。6月1日，日本陆军参谋长斋藤恒，向田中递交了《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》（又称《斋藤方案》），强烈主张，“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，为对华政策的基点。”并建议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下列要求：（一）宣布东三省自立，（二）和日本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，（三）准许日本在中国开垦土地，采掘矿山，（四）中国的行政、财政及军事机构要设置日本人充当顾问。并叫嚣，如果中国方面拒绝，“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”。

为了商讨侵华策略，6月27日至7月7日，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“东方会议”。出席会议的除了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和外务省次官森恪外，还有亚洲局长木村锐市、通商局局长斋藤良卫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、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、陆军次官畑英太郎、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等人。会议期间，森恪提出四点建议：（一）为保护（日本）在中国的“权益”，不问中国本土或“满蒙”，日本均应出兵；（二）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，日本必须坚持各地的治安秩序；（三）东三省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，日

本应予支持；（四）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的政治组织，日本应不惜使“满蒙”与中国分离，另外培植傀儡政权。田中支持了斋藤恒和森恪的主张，于7月7日会议结束时，以“训示”的形式，提出了《对华政策纲领》，公然宣称：“中国本土和满蒙……有所不同”，“特别是东三省，由于在（日本）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，……作为接壤之邻邦，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”。因此，日本可以“根据需要，断然采取自卫措施”。并说“万一动乱波及满蒙”，并可能损害日本的“权益”时，日本“将予以防护”。

摆脱经济危机，解决经济困难，是扩张主义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直接原因。关于这一点，在田中义一7月15日呈给日本天皇的奏折——《对满蒙的积极政策》中，曾有过解释。田中说：“所谓满蒙者，乃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。广袤7,400万里，人口2,800万，较我日本帝国国土大逾三倍，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。不惟地广人稀，令人羡慕，农矿森林等物之丰，当世无其匹敌。”另一个法西斯分子板垣征四郎对于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：据1927—1929年发表的数字，日本从美国进口铁，要付出12000万日元，进口石油，要付出6000万日元，进口肥料硫酸要付出4000万日元，进口烧碱灰和铅，要付出3000万日元，进口木材，要付出10000万日元，合计要付出34000万日元。他算了一笔帐，认为：这笔款正可以用开发满蒙来抵销。即从鞍山供给铁，从抚顺供给煤，从鞍山又可以供给炼铁的副产品硫酸，从吉林方面的大森林取得木材，从满蒙可以绰绰有余的

供给30000万日元。日本国内耕地面积严重不足，每年需从境外输入1,000石米，而东北的情况是：农产品年产额总计约达15000万石，即7、8千石可以出口或转运他处。不但可以解决日本人的吃粮问题，还可以为日本军马作饲料。”

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，经过多年的“经营”，日本侵略者已经把中国的东北“改造”成为日本的原料库和大粮仓。以1930年为例，日本从东北进口的物资占日本整个进口的11%，其中76%的豆类，64%的煤，46%的铄铁，86%的豆饼，都靠东北供应。此外，东北还是日本最大的资本输出市场，这里占它对外投资的70%左右。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前一年的1930年，日本对华投资总额为17.5亿元，其中对东北的投资为11亿多，占各国在东北投资总额的73%，除去苏联的23%（主要是中东铁路），几乎它占了全部。东北的主要经济命脉大都操纵在日本垄断资本的手中。到1931年前，全东北铁路总长约6,044公里，其中有2,338公里要受日本支配。东北的煤年产量约为966万吨，其中79%以上为日本占支配地位的抚顺和本溪煤矿生产。东北的总发电量为156万瓦特，日本占84%。至于制铁业，则几乎完全为日本所独占。

三、箭在弦上

在决定推行“积极”的侵华政策和实行“强硬外交”之后，日本政府便加紧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各项准备。

宣扬“忠君爱国”思想和“武士道”精神，是从思想上

准备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文人，大肆向青年和军人灌输“天皇受命于天”、“天皇是神”，军人是属于天皇的思想。鼓吹为天皇而死是军人的责任和义务，应该“毫不犹豫地为皇家献出生命”。在日本参谋部制订的《精神教育指示草案》中，有“只有效忠天皇的人才能取得胜利”的指示，日本军部还特别强调，武士道精神是“日本对敌作战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”。为此，日本军国主义者竭力开动国内一切政治机器，广泛宣扬歌颂战争、征服、暗杀和死亡的思想，妄图使每个日本国民都把他们的侵略行为，看成是神圣的爱国事业，并为此而不惜牺牲性命。

在宣扬民族主义、沙文主义、扩张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大合唱中，叫得最响，因而也是影响最大的，当推天剑党的代言人北一辉和大行会的理论家大川周明。他们都利用“改新国政”这一口号，宣扬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，对外采取侵略扩张政策，但是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策略却不尽相同。天剑党的核心，主要是法西斯青年军官，他们以血书盟誓的形式秘密结成死党，叫嚣为了“昭和新政”，可以使用非常手段，即在“杀身救国”、“诛戮国贼”的口号下，直接用暗杀的办法，去“铲除”他们认为妨碍“革新”的“温和派”人物，然后再拥立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“强硬派”。大川周明曾多年担任满铁调查部的主持人，他活动的特点，是以日本军部为中心，利用掌握军部实权的“中坚将校”及首脑，推行他对内对外的“革新”主张。为了实现纳粹式的革新，大川周明曾联合一部分军人，企图通过政变组织军政

府，由于机密暴露而失败。

其次是扩军备战，增强军事实力。“东方会议”之后，日本的军事费用连年增加。1927年，日本陆海军费，合计为49,164万日元，占当年总岁入的23.8%。1929年为49,492.1万日元，占当年总岁入的27.1%。1931年为45,462.1万日元，占当年总岁入的29.7%。1933年为86,641.5万日元，占当年总岁入的37.2%，军费开支比例之高，名列世界第一。

在建立“总力战”体制的口号下，日本工业迅速向战时转化。日本军国主义集团，和许多大的卡特尔垄断组织建立了联盟组织，并共同制订军工生产计划。为了鼓励更多的民用企业搞军工生产，或接受军界的军事工业生产订货，日本政府对军工生产提供了巨额的国家补贴。1929年，63%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品出自兵工厂。1930年，有10万人在日本军事部门所属的军工厂里工作，在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部门中，大约有50%左右的从业人员在从事军工生产，2,000多家工厂接受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武器生产订货。

新的军工生产部门，特别是飞机和坦克制造业，优先得到发展。1931年夏，日本三菱飞机公司，开始成批生产重型轰炸机；装甲车、高射炮等其他近代武器也相继投入使用。新的海军造船厂迅速建立，大批武器和弹药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装备部队。此外，日本政府还大力发展与军需品生产直接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，并把它们改造成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经济体制。